

农村基层治理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微观视角

卫龙宝 张 菲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 1509 户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本村组织治理的满意程度主要受到与其生产、生活相关的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导致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经济开发区的农户对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较低；

农村基层治理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表 1 样本的地域分布

	内蒙古	黑龙江	浙江	安徽	江西	山东	海南	四川	贵州	陕西	总计
户数(户)	173	147	107	187	134	165	147	160	157	132	1509
百分比(%)	11.47	9.74	7.09	12.39	8.88	10.93	9.74	10.60	10.41	8.75	100.00

(二) 样本信息

1. 样本总体情况。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和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情况分别见表 2 和表 3。从表 2 可以看出:受访者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 75.81%,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仅占 24.19%;非农收入已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48.97%的样本农户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和经商获得收入。在样本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评价中,“比较满意”和“很满意”的频率合计为 33.93%，“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频率合计为 35.52% (见表 3)。这表明,对于当前的乡村治理,农户的满意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样本基本特征

统计指标	项目	农户数(户)	比例(%)	统计指标	项目	农户数(户)	比例(%)
户主性别	男	1133	75.08	家庭规模	1~2人	125	8.28
	女	376	24.92		3~4人	696	46.13
户主年龄	18~25岁	28	4.84		5~6人	544	36.05
	26~40岁	404	26.77		7人及以上	144	9.54
	41~50岁	413	27.37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2000元以下	325
	51~60岁	367	24.32	2001~4000元		338	22.40
	60岁以上	297	16.70	4001~6250元		256	16.96
文盲或半文盲	131	8.68	6251~10000元	293		19.42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	342	22.66	10000元以上	297	19.68	
	初中	671	44.47	主要收入来源	农业	770	51.03
	高中或中专	298	19.75		非农业	739	48.97
	大专及以上	67	4.44	社会资本	党员	287	19.02
			村干部		233	15.44	

注:主要收入来源中的“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非农业”主要包括外出打工和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之外的其他行业。

表 3 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

	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很满意	合计
频数(户)	232	304	461	340	172	1509
频率(%)	15.37	20.15	30.55	22.53	11.40	100.00

2. 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满意程度。从表 2 可看出,样本农户的收入差距明显。为了分析这种收入差距是否影响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表 4 给出了不同收入组农户的满意程度评价结果。

表 4 不同收入组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

收入分组	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很满意	合计
2000元以下	43	57	102	78	45	325

(续表 4)

2001~4000 元	55	66	88	85	44	338
4001~6250 元	41	54	82	49	30	256
6251~10000 元	39	72	95	56	31	293
10000 元以上	54	55	94	72	22	297
总计	232	304	461	340	172	1509

从表 4 可以看到,对于 2000 元以下收入组的农户,“满意”和“不满意”的农户占该收入组农户数的比例分别为 37.85%和 30.77%;在 2001~4000 元收入组的农户中,该比例分别为 38.17%和 35.80%。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其满意程度越高。与之相反,4001~6250 元收入组和更高收入水平收入组中,农户“不满意”的频率明显高于“满意”的频率,尤其是 6251~10000 元收入组的农户,其“不满意”的比例为 37.88%,仅有 29.69%的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表示“满意”。高收入组农户满意程度较低的可能原因是,当前村庄治理水平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

3.不同主要收入来源农户的满意程度。由表 2 可知,非农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已占有很高的比重,本文对不同收入来源农户的满意程度进行了分析(见表 5)。从表 5 可知,以农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不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分别为 33.90%和 33.77%;而非农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不满意”和“满意”的比例分别为 37.21%和 34.10%。由此可见,不同家庭收入来源的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存在差异。可能的解释为: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部分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主要是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户);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农户倾向于通过直接参与非农产业来增加收入,然而,当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和公共物品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时,这对地方经济发展将产生阻碍作用,进而会导致农户的满意程度降低。

表 5 不同家庭收入来源农户的满意程度

	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很满意	合计
农业	113	148	249	153	107	770
非农业	119	156	212	187	65	739
合计	232	304	461	340	172	1509

(三) 研究方法 with 变量设定

1.研究方法。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总体评价。解释变量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本文用农户对各项公共物品的满意程度来表示——一般而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越高,农户的满意程度也就越高。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评价和农户对各项公共物品的满意程度都采用打分的方法赋值,共分为五个等级,即“很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不太满意”=2,“不满意”=1。由于被解释变量“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是一个五项有序选择变量,其数值越大代表结果越好,因而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参见陈强,2010)。根据张文彤(2004)的建议,在解释变量中分类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使用有序 Logistic 模型比有序 Probit 模型更合适。鉴于此,本文建立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满意程度的有序 Logistic 模型,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_____)

$$\ln\left[\frac{p(y=j)}{1-p(y=j)}\right] = \sum_{i=1}^n \beta_i x_i$$

四、模型运行结果

(一) 估计结果

在模型估计之前,先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自变量的 VIF (方差膨胀因子) 统计值均小于 5,所有自变量的 VIF 平均为 1.5,明显低于 10。这说明,模型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根据上文,为了分析不同收入组农户对农村基层治理的满意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此处的实证分析结果除汇报总体模型的回归结果之外,还对五个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组分别进行回归,总共得到六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本文运用 Stata11.0 软件进行模型回归,所用方法均为前向逐步回归的有序 Logistic 方法。经过逐步回归,剔除不显著的变量之后,各个模型的最终回归结果见表 7。

表 7 模型回归结果

	总体模型	收入组	收入组	收入组	收入组	收入组
农业补贴	0.287 ^{***} (0.047)	0.438 ^{**} (0.092)	—	0.327 ^{***} (0.102)	0.288 ^{***} (0.108)	0.390 ^{***} (0.139)
农业生产设施	0.300 ^{***} (0.044)	0.370 ^{***} (0.089)	0.341 ^{***} (0.088)	0.245 ^{**} (0.108)	0.216 ^{**} (0.101)	0.449 ^{***} (0.116)
农业技术指导	0.195 ^{***} (0.048)	—	0.325 ^{***} (0.099)	0.529 ^{***} (0.160)	—	—
城市就业培训	—	—	—	-0.278 [*] (0.151)	—	—
医疗条件	0.273 ^{***} (0.055)	0.449 ^{***} (0.101)	0.318 ^{***} (0.109)	—	0.234 [*] (0.123)	0.445 ^{***} (0.156)
农村道路	0.234 ^{***} (0.047)	0.290 ^{**} (0.099)	0.379 ^{***} (0.093)	0.262 ^{**} (0.103)	—	—
文化娱乐设施	0.153 ^{***} (0.051)	0.321 ^{***} (0.111)	—	—	—	0.323 ^{***} (0.119)
合作医疗	0.320 ^{***} (0.052)	—	0.351 ^{***} (0.096)	0.260 ^{**} (0.106)	0.429 ^{***} (0.125)	0.668 ^{***} (0.163)
最低生活保障	0.378 ^{***} (0.052)	0.235 ^{**} (0.10)	0.393 ^{***} (0.106)	0.536 ^{***} (0.120)	0.397 ^{***} (0.120)	0.797 ^{***} (0.161)
户主受教育水平	-0.106 ^{**} (0.049)	—	-0.274 ^{**} (0.115)	—	—	-0.292 ^{**} (0.133)
家庭人口规模	-0.049 [*] (0.028)	-0.134 ^{**} (0.056)	—	-0.184 ^{**} (0.065)	—	—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	0.024 ^{**} (0.011)	-0.056 [*] (0.030)	0.044 ^{**} (0.021)	—	0.046 [*] (0.028)	—
相隔最远的两个村民小组的距离	0.036 [*] (0.221)	0.096 [*] (0.050)	—	—	—	0.138 [*] (0.077)

元和 4001 ~ 6250 元收入组农户的满意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对其他收入组农户的满意程度影响不显著。城市就业培训只对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 4001 ~ 6250 元收入组农户的满意程度产生影响,但影响方向与预期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低收入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务农获取收入;而对于高收入农户来说,非农收入已成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对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因而他们对于进城务工技能培训有需求。

村委会到乡镇政府的距离对于不同收入组农户满意程度的影响差异显著。该变量对 2001 ~ 4000 元和 6251 ~ 10000 元收入组农户的影响与总体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而对于 2000 元以下收入组农户,其影响方向相反。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该变量代表获取政府政策偏向的重要性,因此,可能的解释是,政府优惠政策优先供给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将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农户满意程度。该结论为中国历年来实施“惠农政策”的合理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提供了依据。

是否是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满意程度的影响差异显著。从表 7 可知,在总体模型和 6250 元以上高收入组农户模型中,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农户的满意程度反而低,尤其是在 10000 元以上收入组农户模型中,其影响程度最大(-0.898)。这表明,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乡村内部公共物品供给不公平的情况,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应地其新农村建设资金总量也高,因而农户更关注资金分配的公平性。与之相反,该变量对 2000 元以下收入组农户的满意程度影响显著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及其优先次序而不是只注重供给本身,可能更有益处,即更好地了解居民对政府的看法、他们希望得到的服务及其优先次序。除了提高财政收入,还需要通盘考虑政府的职能定位,考察各级政府之间什么样的合作关系才能达到政策目标,

第三,实施分类推进、重点突出、因地制宜的公共物品供给策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户需求情况,实施有层次、有重点、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策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依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要加大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关的公共物品供给,发挥地方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农民同时依靠农业和非农业获取收入的地区,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城市就业培训的质量,以满足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信息和技能的需求;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民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心在于农村文化建设,满足农户的多样化需求。

第四,加强对专项建设资金使用的监管,保证其使用效率和资金分配的公平性。虽然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经济开发区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具有政策支持的优势,为基层组织更好地提供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分配是否公平,都会影响到农户的满意程度评价。因而,要关注公共物品作为在资源分配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抑制,以保证资金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Bernstein, Thomas P. and Lü, Xiaob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742-763, 2000.
2. Guo, Xiaolin: Land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nflict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6: 422-439, 2001.
3. Li, Lianjiang and O'Brien, Kevin J.: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1): 28-61, 1996.
4. Tsai, L.: *Strategies of Rule or Ru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s in Rural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Villager Self-government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eptember 2-5, Beijing, 2000.
5.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0.
6. Saich, T.: 《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民意调查》,《公共管理评论》2006年第2期。
7. 蔡立辉:《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8.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 樊丽明、骆永民:《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670份调查问卷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9期。
10. 樊丽明、解垚、石绍宾:《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8年第5期。
11. 范瑜:《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演进及特点》,《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
12. 何精华、岳海鹰、杨瑞梅、董颖瑶、李婷:《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案例》,《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5期。
13. 马光荣、杨恩艳:《打到底线的竞争——财政分权、政府目标与公共品的提供》,《经济评论》2010年第6期。
14. 宋毅:《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山东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5. 王谦:《基于农民视角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意度和需求程度分析——以山东省三县市的调研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6. 王正绪、苏世军:《亚太六国国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1期。

- 17.卫龙宝、凌玲、阮建青：《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5期。
- 18.杨海坤、张志远：《中国特色政府法治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
- 19.杨永恒：《政府绩效评价中的公众参与：述评、实践与启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20.臧旭恒、曲创：《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与地方政府经济职能》，《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
- 21.张林秀、罗仁福、刘承芳、Rozelle Scott：《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
- 22.张文彤：《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 23.张晓波、樊胜根、张林秀、黄季焜：《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与公共物品提供》，《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期。
- 24.郑方辉、王珩：《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研究——以2007年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 25.郑书耀：《现实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困惑——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考察》，《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2期。
- 26.周志忍：《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我国的实践历程与前景》，《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1期。
- 27.朱玉春、唐娟莉、罗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果评估：来自农户收入差距的响应》，《管理世界》2011年第9期。
- 28.朱玉春、唐娟莉：《农村公共品投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五省农户的调查》，《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3期。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责任编辑：黄慧芬）

（上接第84页）

- 29.王润雷：《全国村级债务形成的几个阶段及成因》，《中国农业会计》2004年第4期。
- 30.王淑娜、姚洋：《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憬焯